权力易使人败坏

我在读了《坏领导》一书后，才知道赤色高棉的某个领导人，从前是个很斯文敏感，很爱好法国诗，很受学生喜爱的教师；当年被国际法庭以违反人道罪判决的塞尔维亚领袖卡拉季奇，原来是个心理治疗师，还是个程度不错的诗人，还发起绿党，显示他很关心生态环境问题。

在知道了这些人物的过去后，我对人的善良邪恶已觉得愈来愈难判断，那些后来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原来也有过一段真好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人生一定在某个重要的阶段出现了分岔，然后就在岔路上越走越偏，那么，改变他们人生的岔路是什么？

权力的确是个坏东西。任何人一旦有了权力，就会有一群攀龙附凤的追随者，他做了对的事，这群人就吹捧造神，他做了不对的事，这群人就曲意庇护，最后整群人就会成为一个只知有敌我，不再有是非的帮派。当这种帮派意识一旦形成，败坏就会往绝对化、极端化的方向走去。因为权力有着这种败坏的本质，所以任何人只要涉及权力，都要格外警惕，权力欲和吗啡上瘾相同。当一个人未发迹之前，他的善良本性尚存，他还知道什么事可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但权力却一步步侵蚀掉这种可做与不可做的边界线，他已无法分清可做与不可做的事，于是绝对的败坏逐告形成。

许多人都一定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所写的《苍蝇王》，一群出身好家庭、上好学校的学生因飞机失事而流落荒岛，这群学生为了集体管理的事，最先是分派，而后是斗争，最后是无法无天地杀人。原本纯洁的少年，当他们的世界有了权力关系，人性也跟着全都改变了，权力之可怕由此可见。前几年，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监狱模拟实验，学生分成囚犯和狱卒等，当狱卒的果然逐渐凶性大发，这个实验紧急喊卡，不能再做下去。狱卒的权力真的会改变人性！

权力容易改变人性，使人败坏，但败坏的程度却在各种社会不同。有的社会，有权力的败坏人物顶多像克林顿那样乱搞男女性关系，或者像尼克松一样，搞个滥权的水门案，像罗德岛州一个市长希安西利用市长权力向人勒索钱财，就已是不得了的大罪过。有权力者虽然都会败坏，各国对败坏的容许程度却不相同，进步的国家由于制度及文化良好，有权力的人即使想做大坏事也不可能，官僚机构不会给他机会，他做了坏事，法律及社会也会把他抓出来。权力使人败坏的程度，乃是对一个国家及社会最大的考验。

因此，我对高层官员腐败大案的判断和许多人不一样，我不会和别人一样用打落水狗的态度来谈此类大案，我关心的是：高层官员都曾经是好人，他们在有了权力后为什么愈变愈坏？他们变坏的过程才是我想知道的。（摘自《南风窗》2012年9期 南方朔/文）

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

英语中有个词叫做“white lie”，谎言既为白色，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。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，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，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。

当“white lie”上升到国家的层面，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，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，名唤“noble lie”，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，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，而且大爱无疆，能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。

有趣的是，时间过去50年，当大多数人都认定所谓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，捷克哲学家齐泽克却在2010年5月的上海，讲述了另一个故事：

“在欧洲，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，如果你问一个孩子：你相信圣诞老人吗？孩子会说：不，我没那么愚蠢，我只是假装相信，从他那获得礼物。如果你问父母，他们会说：当然不信，我们假装相信，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——事实是，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，但是他却发挥作用。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，但是我的观点是，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，它还是在起作用，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，才起作用。”

齐泽克的意思是，所谓的高贵的谎言不必费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，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高贵的谎言，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，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这才是高贵谎言本来面目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样更可怕，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，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。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，信任支柱便被抽离，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。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，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，在这个空间里，大伙儿集体装睡。

齐泽克的故事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：午后的幼儿园里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，阿姨在小床边巡视，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，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。时钟滴滴答答地走，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睡着了，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。当然，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，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，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……

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，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吗？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。（摘自《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濂/文）

有道德，是受的诱惑太少
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认识的一位当地名演员被一家酒店“诚聘”去做“形象大使”，开的价码也过得去，全部工作就是陪酒店老总请的政府官员和客户头头吃饭喝酒。开头效果似乎不错，当地媒体大肆鼓噪了一阵，各方都觉得颇有面子。但时间一长，各方就有了不爽：演员固然是名演员，毕竟是老男人了，官员和富翁见识一回也就足够了，再来若还是见到这样一张旧菜单似的老男人脸，食欲即便不受影响恐怕也提不起太大的兴趣；演员本人则忽然发现，除了性别、年龄的不同和不用上床之外，自己跟“三陪小姐”其实没有什么不同；酒店老总也渐渐觉得，名演员越来越难伺候，不像开始那样随叫随到。

离开酒店后的名演员很痛心，把这次“自取其辱”的经历当做一个深刻的人生教训教育我这一类年轻人：一个人要保持尊严就千万不要受金钱的诱惑。

我当时很认可他的话，暗自下定决心，这辈子决不要被工资和稿费之外的“聘金”之类左右自己的活法。但没想到，等到有一天，有个财政很富裕的文化单位主动提出让我挂个名，他们支付相应的津贴，我还是动了心。若不是当地的财政部门认为那名义找不到相关制度的依据无法付款，我也许就重蹈那位名演员的覆辙了————虽然我不是他那样的名人。听过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位哲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：他问两个男人，如果有人出100元买你们的爱妻，你们是否愿意，两个人都摇头。他又问，如果出100万呢？其中有一个点了头。他继续问道，100亿呢？结果另一个人也点了头。

上面说的是一个笑话，但英国哲学家罗素好像还真是这样想的，他说：人之所以有道德，是因为受的诱惑太少。如何面对诱惑，真是人生的一个大课题。

（摘自《经典杂文》2011年第11期 陈世旭/文）

出来混要靠开场白

自古以来，出来混的都有一套开场白。刘备当年卖草鞋，无奈生意不景气。有一天听隔壁卖耗子药的商贩叫卖，终于参透了一个道理：出来混是要口号的。自此，刘鞋匠逢人第一句话便是：吾本汉室宗亲，乃中山靖王之后也。从那以后，果然吃得很开。

我听过最实用的开场白是A领导的，句式结构简单，随意组合，可以拿下所有饭局。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：陪同A领导检查，接待单位竭尽所能准备好一桌酒宴，嘉宾入座，佳肴摆毕，主人往往含情脉脉地望着A领导。A领导见状，扫视一眼餐桌菜品，淡定地开场：“当年在XX饭店的时候，YY宴请，当时也吃过ZZ，今我终身难忘，今儿这桌菜又让我找到了当初的感觉……”众人马上心领神会，拍手叫好。领导水平就是高，一段开场白既不失自己的身份，又给足了主人面子。

我见过的最有威严的开场白是B领导的，居高临下，气势磅礴，令所有聆听者顶礼膜拜。B领导菜次来到码头，等待出海的船员站得整整齐齐，接受领导训话。B领导扫视一眼群众，清嗓，气沉丹田：“各位船员弟兄们，我的级别就相当于你们家乡的县长，你们平时有谁见过县长吗……”听完B领导的开场白，朴实的船员们立马肃然起敬，拍手欢迎。领导水平就是高，一段开场白顿时让基层员工受宠若惊，心潮澎湃。

最有技术含量的开场白则是C领导的，令人听了恍若见到诸葛亮转世。工作关系，我常陪C领导赴海外考察，每次出行收音机都是必备的，C领导颇有外语功底，每到一地必收听当地天气预报。一次在外地，大清早C领导便起床在酒店散步，驻地人员前来陪同，这时候C领导便做沉思状，忧郁地说：我昨晚夜观天象，今日必有大雨，活动取消吧……

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一段和领导媲美的开场白，虽然我用得上开场白的场合并不多，最多的是每日无奈地在上报文件的左上角写上：尊敬的领导，冒号！

（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2年第13期 乾无古人/文）

乾隆盛世的贫困

公元1793年，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，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。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。他们相信，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，黄金遍地，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。然而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，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。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，为英国人端茶倒水，扫地做饭。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“都知此消瘦”。“在普通中国人中间，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洋洋的脸。”这些普通中国人“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，都受千恩万谢。对我们用过的茶叶，他们总是贪婪的争抢，然后煮水泡着喝。”

乾隆盛世的贫困，还体现在精神上。

到达浙江沿海后，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，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。总兵痛快地应答了。

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。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，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。使团成员巴罗说：“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。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，一个个双膝跪地，接受询问。他们徒劳地哀告道，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，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，总兵不为所动，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。”

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，英国人注意到，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，拉一天“约有六便士的工资”，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。这显然是不合算的，许多百姓并不想受这份工资，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。为了找到替手，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，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。兵丁鞭打试图逃跑，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，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。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，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，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。

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

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，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，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“乾隆盛世”。

（摘自《家庭百科报》）

吴冠中：妻子成全我一生的梦想

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：鲁迅、梵高和妻子。鲁迅给我方向，给我精神，梵高给我性格，给我独特，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，平凡，善良，美。

——吴冠中

金手镯和红毛衣

1942年，吴冠中从艺专毕业，到重庆沙坪坝的一所大学任助教。在这里，吴冠中认识了他一生的情感归宿朱碧琴。1946年，他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半年之后，有个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机会，只有两个绘画的名额，吴冠中考中了。

临去法国之前，吴冠中特别想要一块手表，如果没有手表在国外很不方便。对于新婚的他们来说，根本没有钱买这种奢侈品。朱碧琴有一只金手镯，那是母亲送给女儿的嫁妆，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。吴冠中试探着对朱碧琴说，想把这个金手镯卖了去买只手表。但是，这不仅是母亲送的纪念品，更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，朱碧琴开始时有点舍不得，但看到孩子气的丈夫为一块表整日愁眉苦脸，心又软了。几天后，她对吴冠中说：“这个手镯是真金的，你拿去卖了买手表吧。反正你走后，我就住到乡下去了，也不需要戴这个。”吴冠中大受感动，他深知这手镯在妻子心中的分量，暗暗下决心，将来一定要买一只一模一样的手镯送给妻子。这个愿望直到四十年后才实现……

手表有了，朱碧琴又担心吴冠中在国外穿得太寒酸受人排挤，她卖掉了自己的一件缎子夹袄，换了点紧俏的毛线，紧赶慢赶，织了一件红色的毛衣，既可保平安，又能保暖。大冬天，妻子身上穿的却是老太太们才穿的厚重棉袄，吴冠中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想来妻子也正值青春年华，却为了他不能尽情打扮，他的鼻子瞬时酸了。

爱你到落牙时候

上世纪70年代，吴冠中被调到另一所美术学院，朱碧琴调到了美术研究机构，因为“文革”的到来，他们随着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劳动改造。有一段时期，两个人的劳动地点相距10余里，每周日被允许见上一面。每周相会的那天，要分开的时候他们会相互送别，在半途的地方停下来。那里有几户农家，葡萄架掩着土墙和拱门。吴冠中笑称这是他们的十里长亭。

他的乐观，让妻子的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。在艰难的年代，他们还能那么浪漫地想象。后来，下放生活结束返京时，吴冠中特意去画了那小小的农院，他特意让画面里飞进了两只燕子，代表着他与妻子。

长年的劳作，加上作画的不规律，使吴冠中得了严重的肝炎，总也治不好，同时他的痔疮又恶化，被病情折磨得通宵失眠。看着丈夫如此难过，朱碧琴在临睡前总会摸摸他的头说：“我这一摸，你就一定能睡着了。”可这慰藉没能使吴冠中从肉体的病痛中解脱出来，恶劣的病情一拖几年。

有一天，吴冠中听说，他留学巴黎时的老同学已经成了名画家，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。这个消息，给病中的他一个大大的打击，同时也激起他的雄心和不甘。他不顾妻子的反对，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任性地不停画画。他坚持工作，说自己就是死，也要死在画架前！

吴冠中的健康，居然在忘我的作画中一天天恢复，医生都治不好的肝炎败给了他的疯狂。肝炎好转后，一位高明的大夫动大手术治愈了他严重的痔疮隐疾。也是这一天，吴冠中和朱碧琴第一次谈起了他的病情。吴冠中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年的冬天了。”朱碧琴一听，眼泪在眼眶里晃了几圈，又强逼了回去，她故意生气地说：“你胡扯什么，你怎么能先走呢？我还要等着看你老得没牙的丑态呢。”

来世还要结连理

朱碧琴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，照顾吴冠中几十年，除了下放农村的年月，几十年她没有离开北京去外地旅游过。当孩子们各自成家，子孙绕膝，她终于可以陪着吴冠中一起四处写生，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时候的吴冠中已经是个名家了，他们举案齐眉、相濡以沫的镜头让周围不少人羡慕。

1991年的早春，朱碧琴突然病倒了，病情很严重，是脑血栓。自从朱碧琴病了之后，吴冠中就没办法作画了。由于医院离家很远，他年事已高，来回搭公交，孩子们不放心。他只能减少去医院的次数，没有妻子这个保护伞陪在身边，他心里像猫抓般难受。时不时地，他会偷偷地溜出家门，坐上前往医院的公交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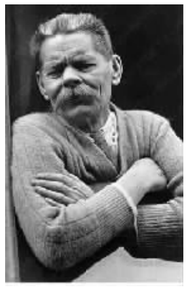
朱碧琴的病情后来发展到了老年痴呆症，她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过去的记忆几乎全没了，她唯一记得的就是丈夫画画的事情。吃饭的时候，吴冠中一定要朱碧琴和他坐在同一张小桌上，有她在身边，这房子才像一个完整的家。

吴冠中将他与妻子朱碧琴的故事，写成了一部作品《他和她》。他最后写道：“她成了婴儿。”他希望她永远是自己怀中的婴儿，那么安静地在他身边待着，让他照顾她。但是，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他。2010年6月，吴冠中在北京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。妻子朱碧琴当时不知道他的离世，他曾说过：“你走在我的前面，是你的福气。”但是他还是先走了一步……

（摘自《幸福·婚姻版》2011年第12期 枫丹白鹭/文）

那情

当高尔基遇见『高尔基』



有一年高尔基出访意大利，在一座小城里看到一张海报，上面写着：“今天剧院将上演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话剧《敌人》，演出后高尔基将亲自登台与观众见面。”高尔基感到很吃惊，因为没人知道他已来到这座城市。

为了搞个水落石出，高尔基去了剧院看演出。剧终时，假冒的“高尔基”登台亮相，只见他满脸笑容，频频向观众挥手致意。

观众离开剧院后，高尔基走上舞台，跟那位假冒者握了握手说：“你好，‘高尔基’先生！”

一见到真的高尔基，假冒者着实大吃一惊，不由得用手捂住脸，坐在了椅子上。他稳定了情绪之后，低声地说：“难道真的是您吗？”

高尔基平静地回答：“是我。”

假冒者深表歉意：“请原谅，我应该向您解释清楚。”

假冒者告诉高尔基：“尽管过去我也努力演戏，可得到的报酬很少。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，我找了这个新角色，就是假冒您这位剧作者。”

高尔基又问：“是谁建议你假冒我的呢？”

假冒者回答道：“是饥饿。现在您可以骂我一顿了。”

高尔基大度地说：“为什么要骂你呢？如果假冒能为你改善生活起点作用，那我是非常高兴的。不过，我还是建议你尝试一下光明正大的公开模仿，走出一条真善美的艺术之路。”

假冒者握着高尔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您！您有像大海一样的宽广胸怀……”

后来，这位假冒者真成了一位颇受欢迎的明星。就连高尔基也认为，他的模仿惟妙惟肖。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百川/文）

那人

肯尼迪狂买古巴雪茄

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时任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·塞林格，至今清楚地记得1962年2月6日发生的一幕。那天早上，肯尼迪把塞林格叫进办公室，要他“帮个小忙”——给总统先生弄1000支古巴雪茄来，而且必须在次日早上完成。

“走出办公室时，我有点怀疑自己能否完成任务。”塞林格坦言，“好在我本人也是古巴雪茄迷，知道许多专卖店，忙到深夜总算搞定了。”第二天上午8点，整整1200支雪茄准时送到了肯尼迪面前。他随即微笑着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份长长的文件并在上面签名——这是一份禁止所有古巴商品进入美国的法案，从此之后，古巴雪茄在美国成了非法产品。

肯尼迪在任期内和菲德尔·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数度交锋。相比之下，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“老烟枪”，尤其爱抽手工卷制、口味适中的“乌普曼”雪茄。这是古巴最老的雪茄品牌。肯尼迪的决策自然不会因为烟瘾而有所动摇。然而众所周知，其禁令的核心目的——推翻古巴政权，至今未能实现。（摘自《青年参考》2.24史春树/文）

那年

《我是一个兵》作者是谁

岳仑，原名蒋耀昆，1930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。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，那时他刚满15岁。参军以后，由于岳仑歌儿唱得好，被分配到冀东十八分区宣传队当了一名宣传员。

1949年8月初，湖南解放。衡宝战役结束后，岳仑所在的部队进入湘桂边剿匪。宣传队也随部队驻邪阳，1950年5月，海南岛解放。此时战士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迫切需要唱新歌。

陆原把在连队收集到的战士“枪杆诗”，改写出了“我是中华一个兵，来自苦难老百姓”。岳仑闻此立即来了灵感。一天中午，他俩来到江边的文工队司务处，合计新歌的事情。岳仑突然心中迸发出激动的旋律，边唱边写出了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陆原也激动起来，接着你一句我一句地修改，压缩，长短搭配。第二段重复“我是一个兵”，加上“忠于祖国爱人民，战争考验了我立场坚定”的内容，再加上熟悉的民间调式，一气呵成。这支歌曲就这样诞生了。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歌声很快在邪阳城到处飞扬。

1951年夏天，在参加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文艺汇演时，该曲获优秀节目奖。1952年9月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艺竞赛大会上，《我是一个兵》获一等奖。此时，这首歌已经向全军传播了。后来，这首歌又被改编成雄壮的军乐曲。同时，在苏联、东欧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出版。（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3.29 赵永春/文）

那事

那曲

国民党将军抢坐飞机

淮海战役中，蒋军大势已去。某日，陈官庄临时机场上空飞来一架小型教练机，飞机给杜聿明送来了迅速突围的命令，同时要接走负伤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。飞行员彭拔臣送完命令，看着高吉人被抬进机舱后，正准备起飞，却发现他的驾驶座位被另一位军官占据了。

彭拔臣说：“教练机不能多带人，你占了我的位子，谁来开飞机？”

那位军官说：“老弟，将就一点，快起飞吧！”彭拔臣说：“这无法将就，请你让开！”于是那位军官自报家门，说他是徐州“剿总”办公室主任、陆军中将郭一予——“中将还不配坐飞机吗？还不够资格吗？反正我有坐飞机的资格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不，大家都不走好了！”这时，飞机外面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家属们开始大吵大闹，有的说要坐大家都可以坐，有的说管他是什么中将把他拉下来。正争吵不休的时候，解放军的炮弹打到机场来了——“我急得满头大汗，心想再飞不走交不了差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屁股坐在中将的腿上，推动引擎起飞。谁知有个倒霉的‘剿总’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，挤在飞机的推进器旁边偏没有走开。推进器一转动，他的手臂断了，腰上裹的金条和银元也被打得满天飞舞，推进器也发生故障不动了。解放军的大炮又打过来，一颗炮弹恰好命中飞机左翼，机尾机脚都受了伤，再也飞不动了。那些瞎起哄的人一哄而散，机场上连警戒兵也跑光了。那位瞎耍赖的中将也早已不知去向。只有高吉人因为跑不动在飞机上干喊救命。哎，太乱了！太不像话了！”最终滞留在战场上并被俘虏的飞行员彭拔臣，事后一想起那个情景便怒不可遏。（摘自《解放战争》王树增/著）